

学术与现实的互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理路

万军杰

摘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史学研究钩沉国家历史,探赜文化兴替,提起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推出许多标志性史学论著,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面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成和演进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具有求真和致用的鲜明特质,担负着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文化传统等结合起来,汲取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史学类型,并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相生相长。客观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为方向导引,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厚重的学理支撑,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切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K03;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3-013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2MZD015)

经由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史观派中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逐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渐趋兴盛。晚近以来,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呈现出逐渐深化的趋势,学者们从不同层面揭示其史学成就、史家群体的学术地位以及社会影响:有的以大历史观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范式与历史演进^{[1][2]},有的从文化抗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贡献^{[3][4]},还有的以地域为界勾勒不同地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致样貌^{[5][6]},等等。不过,既有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关注稍显不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格局与地域联动、治学取向的形成及发展方面亦有可深化之处。而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为一门学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民族危机、党派殊殊、文化传统等现实因素的高度关联性。本文拟围绕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尝试厘清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学术逻辑,以期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些许参考。

一、交响与共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格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面貌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共同塑造的。“七七事变”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奔赴延安和重庆等地,形成了根据地 and 国统区的两大历史研究重镇。他们以史学研究钩沉国家历史,探赜文化兴替,掀起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推出许多标志性史学论著,扩大了马克思主

义史学在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力。

(一)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

全面抗战时期,范文澜、杨松、谢华、何干之、叶蠖生、吴玉章、尹达、佟冬、金灿然等进步知识分子集聚延安,引领和推动根据地历史研究的发展。1937年,张闻天组织设立“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研究委员会”,是延安地区创建最早的史学研究机构。1938年,通过整合有限的学术资源,延安马列学院宣告成立。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7](P258)。延安中央研究院下设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权威学术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根据毛泽东的直接要求,中国历史研究室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重要参照,采取分工合作和集体创作的方式完成《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该著作与何干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论著,从多个角度考察并阐述了中国历史,在重大历史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规范性认识。此外,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应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环境,具有明显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取向。如许立群《中国史话》、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和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等历史读物,以及由历史故事改编的戏剧,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串龙珠》《岳飞》等,对于教育和动员广大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统区相继形成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汇聚于此,开展史学活动。1937-1939年间,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谭丕模、曹伯韩、杨东莼、杨荣国、曹国智、黎澍等左翼史学工作者汇聚于湖南长沙等地。1939年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陆续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转移。重庆地区集中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嵇文甫、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华岗、陈家康、邓初民、吴泽、胡绳等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三厅”等的组织与领导下进行历史研究。1940年,“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引导下逐步发展为国统区团结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1942年,侯外庐与杜国庠等发起创立“新史学会”,“特别注重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团结了顾颉刚、周谷城、张志让等学者^[8](P123)。

同时,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主办多种进步刊物,如侯外庐和翦伯赞主持的《中苏文化》、郭沫若创办的《中原》、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胡绳主理的《读书月报》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舆论宣传的阵地。在史学著作方面,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翦伯赞《中国史纲》(一、二卷)、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等开拓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撰路径;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扩为《中国古代社会史》)、吕振羽《中国原始社会史》、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初稿完成于1944年)等围绕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等从不同维度、多个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

(三)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区分与联动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根据地与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具有较为趋近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关切,他们在中国史诸多领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尤为注重分析中国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性质的变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方式的跃升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强调以历史视野锚定中国革命的时空坐标,形成深化历史研究的合力,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产生了积极作用,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不过还应看到,以延安和重庆为代表的根据地与国统区的社会政治局面及学术氛围大相迥异,分处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具体研究中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规模与研究群体,开显出各具特色的治史风格。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兼具政治意义,且受苏联因素影响较深,其开展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协助阐释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和严峻挑战^[9]。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受到的政治指令性影响相对较小,他们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逐渐摆脱了社

会史论战时期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注重发挥史学的资政功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各种敌对势力及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斗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德国学者罗梅君认为,“延安历史学家被更牢固地统一到党的生活之中”,而“重庆的‘民主主义’历史学家却更忙于与其在重庆或昆明的同事进行学术讨论”^[12](P158)。

尽管存在时空上的区隔与学术氛围、研究路径上的分殊,根据地和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沟通与交流仍十分活跃,共同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声势,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走向成熟。譬如1944年3月19-22日,为反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谬说及其他反动论调,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文《甲申三百年祭》,4月18日即被《解放日报》转载,引起较大反响。10月31日,他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群众》周刊发表,1945年1月23日,《解放日报》全文转发。3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尹达《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4月30日出版的《群众》周刊又予以转载。

二、致用与求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向发力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理论层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求真求实和面向现实的特质。抗战危局之下,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以史学研究支援革命和救亡事业,担负起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使命,涵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

(一) 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发展致用之史学

“五四”以后,实验主义和史学科学化蔚为风气。胡适认为科学的史学尤须排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与现实的社会划清界限。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不是纯粹的书斋之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非常看重历史研究的现实诉求。从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之演绎变迁及社会性质的分析中辨明中国革命的方向,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使命,也是与其他史学流派相区别之处。这一使命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纯学术发展的产物,它的生成和演进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紧密相关,体现出较强的理论选择性和现实目的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主张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要介入现实生活,为社会现实服务。翦伯赞强调,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自己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正在被压迫的“活的人类”和改变历史^[10](P49)。范文澜指出,中国学人务必站在反对日寇、汪伪和汉奸的立场上探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建设民主政治、彰显民族气节鼓与呼^[11]。叶蠼生认为,抗战推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一切学术更加面向实践,使理论层面的斗争和实践更密切地联系起来^[12]。在吴玉章看来,历史是开展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能够增进人民奋斗的信心,并给予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知识^[13](P809)。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因应文化抗战需要,不仅要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指示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还要以历史上民族斗争的荣光激励抗战信心,并通过揭露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汉奸和投降分子的警惕性,反击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散布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倒退论”等秕言谬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对民族危机,自觉融入抗战大局,开展具有鲜明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研究,将史学研究纳入救亡图存的轨道,强调历史研究是论证政治目标的手段和开展理论斗争的有力武器。如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叶蠼生《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等论著,注重摹写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斗争实态,揭露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致力于在使读者了解历史、国情和革命的同时,激发其斗争精神和爱国热忱。又如为清理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及不良影响,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研究取向上强调发扬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渗入^[14](P10),通过书写中国各民族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注重现实性与践行史学求真之原则

参与现实、呼应时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传统和独特优势,然而关照现实不能背离学术求真的本性,对现实的关切与对科学性、客观性的追求并不是互斥的存在。历史研究既要呼应和关照不同

的时代主题、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还要寻求学术与政治、求真与致用间的平衡。

进入1940年代,曾经“互相鄙视”的史料考订派和史观派学人鉴于相互需要而感到应通力合作,并在理论与史实须恰当结合才能产生信史这一观点上达成共识^[15]。史观派强调史观与致用的同时,更为突出史料与求真于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如被冠以“历史哲学家”名号的翦伯赞,呼吁“新的历史家”使用他们已掌握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在史料的总和中把握中国历史大势^[16],推动“实证”与“阐释”两种学术谱系的融合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集求真与致用为一体,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要求发挥史学研究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还颇为强调学术性和创新性,注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围绕史学理论展开深入讨论,细致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尤其重视社会发展之大关节、大转折处,对于殷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明清等前后迭代之际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动和农民运动给予较多关注,旨在明确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确定中国革命的对象、目标与任务,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而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与争鸣,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求真品格和批判精神。譬如在对墨家思想的评价上,范文澜等肯定墨家学说呼吁平等、反对统治阶级肆意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17](P137)。郭沫若却视其“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甚至带有一定“反动性”^[18](P463)。华岗批评郭氏“论据既甚牵强,而历史意义也多被颠倒”^[19](P29)。侯外庐意见持中,强调“对于墨子或偏爱为革命者,或偏恶为反革命者”的观点均有不足,皆应加以改正^[20](P98)。再如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郭沫若提出,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或“东洋的社会”实际上等同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的形态,而“古代的生产方法”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故“作为社会发展之一阶级的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以前的一个阶级的命名”^[21]。吕振羽认为,若仅依马克思的文字顺序来看,郭之见解可说是妥适的,但是,马克思所指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或“东洋社会”,实属于国家范畴的历史时代,因此,郭氏论断与之是存在分歧的^[22]。侯外庐则通过“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23](P2),推论“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之区分。

三、“批判地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又深深植根中国土壤,注重以辩证的眼光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史学遗产,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开新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列主义的文化人”在重庆、延安等地发起“学术中国化”运动,主张“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24],内在地包含了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在历史研究领域,“学术中国化”的使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中国实际、文化传统等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史学类型,为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并促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毛泽东指出,要“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25](P814)。在他看来,“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指传统文化中“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26](P707-708)。张闻天强调,“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中同样蕴含着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可以通过扬弃的方式,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和养分,建设扫除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新文化^[27]。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改正了过去在文化运动中武断抹杀民族特征的倾向,更加重视本民

族的传统文化^[28](P306),致力于“使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特殊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一个整体”^[2](P160)。郭沫若谈及新、旧文化关系时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29](P86),要“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吸收异质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创造出更高级的新文化^[29](P90)。侯外庐经由社会史的途径审视思想文化史,既强调把握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又注重分析每个时代思想流派对前代之继承以及各思想流派间的关系,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不同思想家和各思想流派的唯心主义因素和保守倾向,发掘和褒扬唯物主义思想成分、无神论思想及自由民主思想萌芽,旨在“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及“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追溯和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30](P307)。吕振羽认为,民族的新文化绝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来,而是要从旧文化的母胎中孕育而生,实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31](P250)。因此要珍视民族文化遗产,把握民族文化传统的具体内容,批判地继承其中积极、进步和有生命力的因素,同时辩证地对待世界上其他优秀文化成果,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通过“民族肠胃”来“消化”,使之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构成要素^[31](P262)。柳湜提出,“要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一切进步的文化,溶化它,通过民众的特点,历史的条件,中国抗战建国过程中的一切具体问题,把它变为我们自己的灵魂,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2]。

郭沫若《十批判书》、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及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论著,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中探索意识形态的发展动向,以质量互变的观点揭示社会思潮的起伏与更新,并努力找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为推动二者相融相通、相生相长,创造新的文化形态作出重要贡献。

(二) 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

不同的历史时代、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等,塑造了史家的社会性,自然而然影响其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或明或暗地融会于他们的史学著述中。本质上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分别隶属两种迥然相异的史学形态,但传统史学在普遍性问题的认知和判断上不乏真知灼见,许多认识是超越古今之别的,如无信不征的精神、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以及“才、学、识、德”的治史标准等,对于今人治史仍多有启发。推动传统史学的创造性转化,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传统史学之上,汲取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体现出对传统史学的扬弃与改造。

其一,肯定和鉴纳传统史学的编纂方法。翦伯赞认为,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历史方法,即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方法,能够在记述个别历史人物时呈现出某一时代的社会内容,并非完全等同于家谱或墓志铭汇编^[33](P124-126)。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采用与传统历史观念相适应的“年代记的叙述法”^[14](P10),吸收“书写人民历史”的通史“家法”和以《通志》《通典》《文献通考》为代表的通志体编纂思想。

其二,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的考据之学。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之一,侯外庐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初期存在着重理论方法、轻史料考辨的弊病,主张“谨守考证辨伪”,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相统一,强调研究中国古史必须接受清代考证和卜辞金文家的治学传统^[23](P2)。在翦伯赞看来,乾嘉学派恪守“无信不征”的治史方法,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堪称最为珍贵的学术遗产。因此,如要引导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须将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掌握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进行学术的拓荒工作^[10](P6-7)。1945年5月,翦伯赞在复旦大学作了《史料与历史科学》的主题报告,后有书店请其“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他即以演讲稿为基础撰成《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付梓^[33](P19)。在此前后,翦伯赞相继发表多篇关于史料问题的文章,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与发展。

其三,接续和发扬传统史家的致用思想。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肇建之初,即显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质。翦伯赞强调,史家之要务就是与一切歪曲的历史观

作坚决的斗争,使中国人民在自己历史的指导下,把“主观的斗争配合于客观的历史倾向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34]。范文澜撰著《中国通史简编》时,既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又继承了包括浙东史学精神在内的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他明确提出,“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17](P1),赋予通史经世以新的内涵。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互促共进

历史地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学术与政治、理论与现实的多维互动中不断演进的。民族危亡之际,抗日救亡的时代强音敦促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历史研究和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围绕唯物史观的运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学术中国化”等问题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提供了方向导引,构成了规训和约束,而史家的史学研究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

(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探索

历史研究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但空谈理论而不重视史料发掘肯定是不正确的,反之仅凭史料的堆砌罗列而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也会限制学术的生长。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文本,运用唯物史观从总体上考察并衡论中国历史走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有益指导。比如在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问题上,毛泽东明确“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阶段性转变的标志^[26](P672-673),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将中国近代史区隔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26](P696)。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26](P626)。对于中国近代史主要矛盾和主要线索,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26](P631),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6](P632)。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断推动建构了一套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近代革命话语体系,在历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得到诸多史家的肯定。翦伯赞在探讨“侯景之乱”时运用《矛盾论》揭示的矛盾转化理论,推断当时南朝汉族与北朝胡族间的矛盾业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北方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与南方本地的人民群众及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已然转化为主要矛盾,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35](P8)。范文澜高度重视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倡导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古今中外法,认为古今中外法“包括了全部唯物辩证法”,旨在以时间和空间的二元维度,从古今中外四个方面考察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当前具体情况、内在基本特征、周围相互关系,并于此基础上加以统合研究,目的是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37](P79-80)。吕振羽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战线,早期以来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展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与“尊孔读经”的道统史观派、战国策派等“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各流派和其帮手”,以及标榜经济史观的陶希圣派和托派等宣传卖国投降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37]。叶蠼生强调,毛泽东的著作指明了如何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科学方法具体的中国化,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和解读中国的历史,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12]。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推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左翼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相抗争的工具和抓手,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厚重的学理支撑,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本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如马克思主义史家在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形成的若干理论话语,全面抗战时期即被吸收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的重要文献中,有力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从文本内容上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明显汲取了历史学界的相关成果。1938年9月,延安部分学人合编的《社会科学概论》出版,书中提到,“中国自周秦以来,也是完全封建的国家。周是封建割据的国家,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专制主义的集中的封建国家建立了起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延长了二千多年,其中虽然发生无数次的农民暴动,但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发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没有一个新的阶级来领导农民,所以农民暴动,还只是被利用来改朝换代,地主阶级的统治,还是继续下来,封建关系,还是没有打破”^[38](P2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类似话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26](P623-625)。

毛泽东相当重视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和吸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营养。他致信范文澜说:“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39](P149)对于陈伯达的孔老墨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亦持褒扬态度,认为其墨子研究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39](P127),对孔子思想的揭示“大体上是好的”,肯定了孔子观念论哲学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39](P13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概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将二者分立建构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孔墨哲学观点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还影响到党的建设话语创新与相关政策制定。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颇具代表性,通过明王朝覆灭、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由胜而骄,旋即走向失败的悲剧性历史事件,用讽喻手法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同时告诫革命者要牢记宗旨使命,不忘初心。此文随后被《解放日报》转发,引起毛泽东等人高度重视,成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之一。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40](P217)1943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下发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要求全党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胜利,万不可冲昏头脑,重蹈李自成的覆辙^[41](P504)。1944年,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员干部要以李自成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5](P948)。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告诫全党要克服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的情绪,不要中了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

五、结 语

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特殊形势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有地域之别却又联动共进的基本格局。分处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积极投身文化抗战的时代洪流,以学术研究和现实关照的二元视界,致力于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对中国历史实际的考察、解读与分析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思想领导下,秉持致用与求真的品格,通过历史的实证研究,在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揭示中国历史演进态势的过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并以科学的历史认识促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同时,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探索及其建树,切实助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革故鼎新,为建设中国历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毛泽东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40](P19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42](P16)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珍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一是继承并发扬“学术中国化”之精神,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实事求是地开展历史研究;二是树立大历史观,以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史学中有意义、有价值、有启发的学术成果;三是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重视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理论知识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四是保持开放包容的心境,博采世界史学之长,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融通中外史学资源,积极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参考文献

- [1] 陈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构建论纲.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
- [2] 罗梅君.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孙立新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年.
- [3] 王继平, 董晶. 文化抗战视野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贡献. 史学理论研究, 2021, (3).
- [4] 张正光. 论延安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中共党史研究, 2010, (7).
- [5] 洪认清. 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 [6] 于文善.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3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8] 侯外庐. 韧的追求.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 [9] 黄静.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 学术研究, 2013, (2).
- [10]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1] 范文澜. 斥所谓中国文化的同一性. 解放日报, 1943-07-10.
- [12] 叶蠖生. 抗战以来的历史学. 中国文化, 1941, (2/3).
- [13] 吴玉章文集(下).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7.
- [14] 吕振羽全集: 第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15] S. Y. Te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9, (2).
- [16] 翦伯赞. 略论中国史研究. 学习生活, 1943, (5).
- [17]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8]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19] 华岗. 中国历史的翻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20] 侯外庐.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上海: 文风书局, 1944.
- [21] 郭沫若. 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主于论究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文物, 1936, (2).
- [22] 吕振羽. “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 理论与现实, 1940, (2).
- [23] 侯外庐.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 重庆: 五十年代出版社, 1943.
- [24] 嵇文甫. 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 理论与现实, 1940, (4).
- [25]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6]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7] 洛甫. 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 中国文化, 1940, (2).
- [28] 胡绳全书: 第1卷(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2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1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30] 侯外庐. 近代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1] 吕振羽全集: 第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32] 柳湜. 论中国化. 读书月报, 1939, (3).

- [33] 翦伯赞. 史料与史学.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 [34] 翦伯赞. 中国历史科学中的实验主义. 读书月报,1940,(3).
- [35] 翦伯赞全集:第5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 [36] 范文澜全集:第10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37] 吕振羽. 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版三周年. 历史研究,1960,(5).
- [38] 社会科学研究会. 社会科学概论. 延安:文化出版社,1938.
- [39] 毛泽东书信选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40] 毛泽东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41]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4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The Interplay Between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Reality: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Wan Junji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conducted research to reconstruct national history and decode cultural transitions, initiated discussions on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historical issues, produced many landmark historical works, and shaped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hich undertook the dual missions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with a distinct pursuit of truth and practicality, wa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China at that time. By combining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with China'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ultural legacy, they drew on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to forge a distinct historiographical paradigm, and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mutual reinforcement, and common growth of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as guided by the innovative theo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in turn, provided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PC'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ubtly influencing the CPC's theories and policies, and effectively advancing th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cademic activities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 作者简介 万军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桂 莉